

# 潜沉务实以“润身”，奉献报国以“淑世”

南开大学立德树人百年间

本报记者 翟永冠、黄江林、邓中豪

昨日上午，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大会隆重举行。数万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南开师生齐聚南开园，诵校训，唱校歌，念“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声音响彻云霄，飘荡在校园上空。

百年岁月，沧海桑田，南开大学培养了二十余万名学生，培养出包括周恩来、曹禺、陈省身、郭永怀在内的一大批国之栋梁与名家大师。

百年南开，风华正茂，那些被深深烙下“南开印”的师生，一种独特的气质赓续传承——既有家国情怀爱国志，又有淑世润身报国心，还是潜沉务实谦君子。

## “端在教育”

关于南开大学的一切，要从1894年说起。

这一年，受命担任贵州学政的严修，为中日之战倍感焦虑，逐渐认识到，中国欲图自强，“非从创办新教育不可”。

这一年，中日海战，前方吃紧，清政府急调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增援，18岁的张伯苓也参加了此役。北洋舰队的第一艘军舰刚刚出海，就被日舰击沉，张伯苓平生第一次遭受强烈刺激，慢慢认识到，“自强之道，端在教育”。

两位以“为国育才”为志的人，在1898年10月29日迎来历史性的相遇。38岁的严修聘请22岁的张伯苓到家馆任教，共同开启了育才救国的事业。

到了五四运动风雷激荡的1919年，南开大学诞生了。

创校之初，南开“校父”严修就勉励南开学子：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建校校长张伯苓则说，“为国家办教育，办以国家为最高目的教育”。

南开大学爱国之魂，就此凝铸。

“窗明几净思多快，国破民愁意转烦。”1922年刚考入南开大学的于方舟，怀着“以己为舟济苍生”的誓言写下这句话。

1923年，于方舟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于方舟当选委员长，同时青年团南开大学支部开始筹建。1924年，于方舟主持成立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任书记，成为天津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28岁的于方舟英勇就义，成为南开大学培养的第一位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

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张伯苓校长令校工每日敲响校钟，先敲九下，再敲一下，再敲八下，用以警示全校师生勿忘国耻。他召集全体学生慷慨陈词：“中国之前途较日本有为，吾不应畏日人。”他要求，南开学生把此次国耻“铭诸心坎，以为一生言行之本，抱永志不忘、至死不渝之志”。

因为“反日大本营”，南开大学被日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1937年7月28日深夜至29日凌晨，历经日寇野蛮轰炸，南开大学变为一片废墟，半座“思源堂”成为仅剩的建筑。

采访到这一幕的记者爱泼斯坦在《人民之战》中写道：“他们的飞机一队队飞到南开的上空，飞得很低，简直是把炸



▲张伯苓。新华社资料片

►10月17日，演员表演音舞诗画《一路向南》。

当日，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晚会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体育馆举行，南开大学师生员工、海内外校友及社会各界友好人士齐聚一堂，礼赞南开大学100年不平凡的光辉历程。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的“中国物价指数”，也是被国家和社会承认的唯一的中国物价指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南开怎样适应历史转折发展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头，时任校长滕维藻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这就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需要，调整学科布局。

在当时没有土地、没有资金、缺乏人才，内部还有很多历史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滕维藻带领南开大学积极发展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学科，先后建立了博物馆学、法学、旅游外语、旅游经济管理、金融学、保险学、审计学、国际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编辑学等一批新的学科专业，形成了专业、系科比较齐全的文科教育学科体系。同时还建立了应用化学、电子学、计算机应用、生物医学、生物工程等一批理工科专业。

1980年8月，费孝通来到南开见滕维藻、郑天挺等“西南联大时期的老朋友”，确定在南开大学办社会学专业。1981年2月26日早晨，费孝通裹着棉外套，呵着白气，在南开大学主楼319教室的讲台上操着浓浓的吴音，讲着自己的学术经历。这是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开学典礼，台下坐着54名学生。

这54名学员中，日后有32位成为社会学教授，14位成为社会学系主任（或院长等职务），5位成为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副会长。

在社会学专业班开办四年后，南开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陈省身在发言最后说：“我将为中国数学、南开数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陈省身是20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之一。1926年连跳两级考入南开大学，陈省身还不满15岁，是全校的少年才子。

为了不满15岁成为数学大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能独立培养高级数学人才的基地；为了证明中国人与外国人一样完全有能力作出世界水平的杰出贡献，使中国数学家在国际上能与外国数学家“平起平坐”，陈省身用他的晚年践行了对国家的诺言。

人少所少，我所专长；人尚未及，我

能先登。新时代，南开师生在科研报国的道路上奋力跋涉，成果频出：曹雪涛团队成果“炎症性免疫反应的新型分子与细胞机制”入选2018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赵新团队研发的“面向生物医学工程的微操作机器人系统”入选“2018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

## “容止格言”

1919年，南开大学有了第一张开学合影。96名开山弟子中，第62号学生周恩来日后尤为杰出。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主任徐行说，在大学里周恩来成为天津青年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觉悟社”。1920年周恩来被反动政府追捕，严修与张伯苓商议，以“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赴欧洲深造。

后来，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人劝严修停止资助，这位老先生说了一句“人各有志”，但资助依旧没断。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于1951年、1957年和1959年三次重返母校。1959年，正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周恩来走进职工食堂，和职工们一起吃棒子面、窝窝头和咸菜。至今，记录这一场景的照片，一直挂在食堂一进门迎面的墙壁上。

“我是爱南开的”，周恩来如此深情告白。矜而不争、潜沉务实、文质彬彬，周恩来是南开气质的示范，这样的气质也逐渐成为南开学生的一大特色，正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程同顺所说，南开大学出君子。

气质的养成有很多种途径，但对于南开人来说，第一课可能就是一面镜子，上面刻着这40个字：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质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这是南开“校父”严修亲自为南开学

生立下的40字“容止格言”。张伯苓则将此作为“镜箴”镌刻在宿舍门廊上镜处，并沿袭至今。

有人分析，从内容看“镜箴”既没有要求学生好好学习，也没有要求学生尊敬师长，甚至连遵守学校纪律都没有提。但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话语，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入校的学生有了一个好的面貌，精神状态自然也会焕然一新；内在气质上，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去学习，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待人处事，不骄傲，不狂暴，不懈怠。

在这样的环境下，南开师生呈现出矜而不争、潜沉务实的气度，南开大学很多“甘坐冷板凳”的大师就是如此。

1936年，28岁的杨敬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37岁留学生津，40岁回国教书；50岁到70岁，被错划右派，其间翻译了总计200万字的7部经济学著作、定稿校审了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71岁平反后，在国内率先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86岁才从大学讲台上退休；88岁写完20多万字的《人性谈》；90岁翻译74万字的亚当·斯密《国富论》，95岁又增译6万字；100岁出版27万字的自传《回顾述怀》；105岁《人性谈》再版，口述了一万多字的改动……

在他108岁高龄时，被问及如今思考最多的问题，杨敬年说：“我还是在想，中国的未来。”

曾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1952年来到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把最成熟的学术带给了南开大学”。郑天挺之子、明清史专家郑克晟曾回忆，“他刚到天津时，由于教授只能有一间屋子，是住杨石先校长匀出的一间屋子，带来的书太多了，父亲只能睡地上。”

郑天挺的到来，为南开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探微集》《清史探微》《及时学人谈从》等著述的学术价值至今不衰，与杨志玖教授共同编纂完成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历时20余年，被史学界赞誉为“扛鼎之作”。

有这样的老师，就有这样的学生，就

如同专家们到南开大学考察教育，得出的结论是，南开大学的学生“基础扎实，不事张扬”。

2005年从南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毕业的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回忆，是南开安静朴素的校园和踏实学习氛围，让他找到了方向，培养了耐心、踏实、做事情不讲捷径，尽可能基于长期来做思考的心智。

## “不负韶华”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南开校歌第一句，便是如此表达。

当年南开被炸，张伯苓大义凛然：“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不灭者为南开之精神！”

但凡名校，必有精神，惟其精神，才能经世而传承，历久而弥新，辐射出跨越时空的特质。

爱国奋斗，淑世润身，朝气蓬勃，文质彬彬……这些经过厚重历史和前辈师长赓续传承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南开学子。

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申泮文曾深情指出：“当我想到校歌里这段名句‘巍巍我南开精神’的时候，我就感到我仍然年轻，依然浑身充满了力量。”

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先生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赠给南开大学。这位“中国最后一个穿裙子的先生”，曾在讲座中如此说道：“我之所以90多岁还在讲，因为我觉得我既然认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么多美好、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我应该让下一代的人能够领会，也能够接受。”

“我平生经过离乱，个人的悲苦微不足道，但是中国宝贵的传统，这些诗文人格、品性，是在污秽当中的一点光明，希望把光明传下去，所以是要见天孙织锦成，我希望这个莲花是凋零了，花也零落了，但是有一粒莲子留下来。”叶嘉莹说。

踏入南开门，烙下南开印，秉承南开魂，南开大学就像是一个大熔炉，影响一位又一位南开人。

曾任南开大学校长的饶子和说，来到南开大学，我们一起变成了南开人，那种见到“河南开封”都会首先念出“南开”这两个字的南开人。

如今，南开大学迎来自己的第一个一百年。南开精神依旧传承，在新时代被赋予更加深刻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开大学考察时，勉励南开师生：“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希望你们脚踏实地，在新的起点作出你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贡献，成为南开大学新的骄傲。”

如今，恰逢南开大学新百年，在9月8日举行的2019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5000余名研究生以青春告白祖国。在入学第一课上，有人吟诵的几句话，可能代表着他们共同的心声：

知中国，服务中国，  
爱中华，复兴中华，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 今年诺奖两作家，“同寻”历史与现实勾连的通道

田泥

近日刚刚斩获2018年、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与彼得·汉德克，以基于现实的幻象构筑独特的艺术气质，赢得世人关注。但同时也引发了有关诺奖的“冲击波”，并延伸出诸多话题与后续效应。

究竟两位诺奖获得者，如何以艺术展开了幻象的寻找，构筑了梦的现实，并获得想象之外的支撑，探寻人的存在形态及意义？我们可回到文本，看看他们各自的内心世界。

其实，中国读者对两位作家并不陌生。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是波兰女作家、诗人、心理学家和剧作家。代表作有《书中人物旅行记》《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航班》等。其中，《太古和其他的时间》（1997年）和《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1999年）先后获得波兰最高文学奖“尼刻奖”，并被译介到中国。她的诺奖获奖理由是：“她用百科全书式的热情呈现了一种充满想象的叙事，代表了一种跨越重重边界的生活方式。”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由数十个短小的特写、故事、随笔集结而成，是一部多层次、多情节的小说，以拼贴画的形式散淡构成。内在的线索看似无形，却潜藏在叙述中。波兰语翻译家易丽君在

《文学创作中的七巧板（译序）》一文中这样介绍：“她善于将迄今看起来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联在一起：将质朴和睿智联系在一起，将童话的天真和寓言的犀利联系在一起，将民间传说、史诗、神话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其表现手法可以说是同时把现实与魔幻乃至怪诞糅合为一，文字在似真似幻中反映出一个具体而微妙的神秘世界。”小说以率性的拼贴方式，在梦与现实、想象与历史的交接处，探索生命本体，发掘生命意义。作者凭吊过去葱郁的波兰景象，将目光停留在现实层面，透出对生态环境的担忧，以及对历史中原初生命形态的追索。

作家以隐喻的方式，勾勒波兰在历史中因环境与战争导致的流变，真实与虚构、现实与历史、生活与传奇等相互缠绕，构成了一部散淡的史诗。梦与现实的撞击，城市与人的纠葛，萦绕在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神秘的气息。于是，自然、生命、爱、性等，都在梦的现实中展现，显示出生之游离与死之飘忽间的种种轮回。作家以梦的方式去寻找人与自然的契合，但宇宙在秩序与混沌中构成了世界，世界又在游移中失去具体的可知性，人显示出极度的孤立无助。而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蕴藏着作家对当今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和忧虑，表达了对于原始自然生态图景的向往，探寻着人生的意



▲这是10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文学院拍摄的2018年和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代表作品。

新华社记者郑焕松摄

义和世界万物存在的奥秘。

相较于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温柔奇幻，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彼得·汉德克则显得极具反抗性，其创作也更具叙事性与史诗性。这位被认为是当代德语世界最重量级的作家，是毕希纳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的获得者。他于1942年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他的代表作有：剧本《骂观众》、小说《守门员对点球的焦虑》等。此外，汉德克

与文德斯合作编剧的《柏林苍穹下》更是影史经典，自导的电影《左撇子女人》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凭借着具有语言学才能的有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经验的外围和特异性。”汉德克一直热衷于对内心世界的研究，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黄蜂》（1963年），以自己孩童时代的经历为底本，充斥着梦境、村庄和战争。之后，他撰写了被人诟病的“说话剧”《骂观众》（1966年）。这部作品其实和辱

骂没有关系，只是用近似音乐的关系，来表达和分析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节奏。作品《卡斯帕》（1968年）则反思规范意识与异化的语言秩序对思想的束缚，在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堪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严格地说，汉德克早期作品多是反结构、反情节、反人物塑造的颠覆样式。

汉德克曾倡导自我与现实接触，以主体观察为“真相”的“新主体性”文学。在后期代表作中，最为突出的是以女性为后来的表达。如小说《无欲的悲歌》（1972年），写出了天主教母亲在宗教、习俗和道德的礼仪中生与死的故事，这部小说被视为上世纪70年代德语坛“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左撇子女人》（1976年）展示了女主角玛丽安娜解除与丈夫的婚姻，坚定追寻自我的故事。而《铅笔的故事》（1982年）等表达了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显然，生存现实空间的缺失和找寻自我依然是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并通过对幻象的寻找，来实现自我构想中的完美世界。

上世纪90年代后，汉德克创作带有政治倾向的戏剧，以揭露战争、暴力等对人性及文化的摧残。1995年，汉德克前往塞尔维亚旅行，写出了游记《冬日的旅行》。2016年，汉德克曾到访中国，在北京、上海及乌镇均举办过活动。在接受

“澎湃新闻”采访时，他曾指出应该平衡不同方面的观点，当西方媒体称塞族是“邪恶”时，他用《冬天的故事》来传达塞尔维亚人自己的声音。彼得·汉德克中文译者梁锡江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也提及，“求真”或揭露真相的冲动是贯穿汉德克写作生涯的主线之一，同时他也关注弱势群体和普通人的生活，能够“用优美的笔调，用超脱的、富有同情心的幽默感去描述这一切”。

彼得·汉德克的创作涉猎广泛，但叙事性、史诗性的创作是他的重点，汉德克向来反抗传统现实主义叙事，但最终叩响了现实主题的大门。反抗文学介入政治的他，无疑走得更远。“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一直在寻找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平衡。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与彼得·汉德克都有乡村田园生活经验，他们以自己的视角看待历史与现实，或以奇幻精妙的叙述方式，展示隐秘的内心世界并反思历史；或跳出传统意义上的书写样式，以文学的“别一种样式”展开对幻象的寻找，构筑了一个多义的精神故乡。而寻求历史与现实勾连的通道，直面人性与现实的冲突，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是他们在写作中的共性所在。